



辛亥革命 在 云南

云南之光·百年辛亥回眸

李晓明 史亚黎 /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辛亥革命在云南

——云南之光·百年辛亥回眸

李晓明 史亚黎/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在云南:云南之光·百年辛亥回眸/李晓明,史亚黎编著.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489-1015-2

I. ①辛… II. ①李… ②史…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云南省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9350号

策 划:方绍忠 赵文红

责任编辑:赵文红 方 帆

特邀编辑:李江文 林 丰

装帧设计:贺 涛

责任校对:胡国泉 梁 红

辛亥革命在云南——云南之光·百年辛亥回眸

李晓明 史亚黎 编著

出版发行: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制版印刷:昆明美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8.75

字 数:145千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9-1015-2

定 价:39.60元

目 录

第一章 从武昌起义到云南辛亥武装革命爆发	1
武昌城头一声枪响	2
云南率先响应武昌起义	6
第二章 广泛的多民族群众基础	8
抗法英雄刘永福	9
片马抗英斗争	10
边塞伟男刀安仁	12
第三章 “同盟会”奠定的革命基础	17
云南近代民主革命五大夫	17
创办《云南》杂志 宣传革命思想	22
发动各界人士 进行反清革命活动	24
第四章 雄厚的军事武装基础	32
讲武堂：清末民初最先进的军事学校	33
讲武堂的灵魂：总办李根源	38
讲武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学校	41
民主精神锻造的“革命熔炉”	44
第五章 辛亥革命前云南的反清武装斗争	48
1908年的河口起义	48
马西克兵变	54
杨振鸿发动的永昌起义	55
云南革命党人与广州起义	57
蔡锷到云南	61
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	64
山雨欲来风满楼	65
紧锣密鼓商定昆明起义	66

第六章 云南辛亥武装革命大爆发	72
腾越起义打响云南辛亥革命第一枪	72
昆明“重九起义”	74
朱德火线上被提拔为连长	78
奋力攻打军械局	79
拿下总督署，攻下五华山	81
昆明“重九起义”路线图	83
军民一心夺取的胜利	84
临安起义紧随后	85
云南辛亥武装革命的特点	87
第七章 “南北各省之冠”的云南新政权	95
第八章 援川援黔作战	101
朱德颂诗有三首	102
龙云、卢汉加入援川军	103
第九章 挟辛亥革命胜利之威入藏平叛	106
第十章 捍卫辛亥革命成果	110
中华民国成立	110
自编自演的卖国复辟丑剧	113
护国运动首先从云南开始	114
护国三军 亮剑讨袁	116
袁世凯狗急跳墙	119
四川及湘西战场	120
滇桂边境和两广之战	123
云南境内的战斗	126
袁世凯一命归西	128
彪炳史册的云南辛亥革命和护国首义	128
第十一章 制度更新歌乐土	133

第一章 从武昌起义到云南辛亥武装革命爆发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十七天，云南相继发动了腾越起义、昆明“重九起义”和临安起义三大武装革命，不仅成为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而且是革命最为彻底的省份之一。



武昌起义群雕像

武昌城头一声枪响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的湖北武昌起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枪。在它的有力推动下，全国各地反清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迅速结束了清王朝260余年的统治，埋葬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辛亥武昌起义亦被称之为“武昌首义”，这场革命之所以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爆发，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有一定的偶然性，而绝非一个孤立的重大历史事件。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初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半



武昌起义纪念馆前的孙中山雕像

封建社会的进程，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武装革命此起彼伏。清政府为挽救垂死的命运，提出和实行了某些“新政”：1906年抛出“预备立宪”，实行所谓的宪政改革，但实质上是加强皇族权力，引起立宪派的不满。1911年5月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有9名（其中7名是皇族），汉族为4名，被人叫做“皇族内阁”，更让立宪派大失所望，甚至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着清王朝立宪改革的失败，在“西学东渐”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越来越多日愈觉醒的知识分子成立了许多革命社团组织，出版宣传民主思想的进步刊物，强烈呼吁、迫切要求改革现实。这时，即使在西南边陲云南的学生中，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高涨得不可以语言形容，每次集会都是

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地说：“要救国非推翻清王朝不成功”……”清政府试图通过立宪来消弭革命，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反而唤醒了民众的觉醒。在这一历史时期，虽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因清政府的追捕、通缉而流亡国外，但他通过自己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不断地向国内输送革命力量，从1905年到辛亥革命前夕，已经组织发动了包括云南河口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内的10次武装起义。这10次起义尽管在清军的镇压下，都先后失败了，但却用鲜血和生命激励着不屈不挠的革命者，重新组织力量，随时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以革命风雷激荡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号中山。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国民党创始人，他一生志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1923年1月与苏联代表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改组国民党。次年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誓，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留下“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以“天下为公”的精神，毕其智慧、胆识、才干和生命，贡献给灾难深重的亿万中国同胞，被世人尊称为“国父”。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我们要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对孙中山革命的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当历史的车轮驶向1911年之时，清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借以维持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出卖给英、法、德、美等国银行使用，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各地的人民群众群情激愤，由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人之多。“保路会”每次集会，到会者动辄成千上万，尤以四川最为激烈，以反清斗争为焦点，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加之不堪清政府的剥削与压迫，民不聊生，全国哀鸿遍野，而这年进入夏季后，大雨滂沱，江河泛滥，长江两岸自宜昌以下成为

重灾区，“号啼病泣之声闻数十里”，广大饥民“相约执竿蜂起”，发生的“抢米”风潮就有八九十次之多，进一步把内外交困、腐朽透顶的清王朝推到了火山口上。

武昌雄踞长江流域和中国大地中部，北望辽阔中原，控制着南北交通，有“九省通衢”之称。它是中国内地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商业的繁荣、贸易的发达仅次于上海。原湖广总督、洋务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张之洞在这里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相继兴建了枪械厂、炼铁厂、丝绸厂、火柴厂、面粉厂等一批近现代企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基础。因此，早在1904年7月，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等人就在武汉成立了科学补习所，秘密从事革命运动。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相继投入新军，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当科学补习所准备响应“华兴会”起义的计划失败受到牵连后，刘敬安又利用有合法地位的教会阅览室，于1906年组织了秘密的革命团体“日知会”，继续从事反清运动。1911年6月，汉口英租界捕房侦探无理打死人力车工人，当1000多名人力车工人聚集在英国巡捕房前，要求惩办凶手时，英国领事下令向工人开枪射击，大批清军赶赴现场，协同帝国主义镇压爱国群众，激起了全市工人的无比愤慨。武汉各界数万人集会，强烈抗议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暴行。而面对四川群众“保路”斗争的高涨，四川都督赵尔丰下令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数十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赵尔丰被称做反动残暴的“屠夫”。愤怒的四川人民掀起了武装暴动。清王朝为扑灭四川人民“保路运动”的反抗斗争，派出粤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于是年6月率领部分湖北新军从武昌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的力量大为减少，从客观上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而此时湖北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社”经过长期的秘密宣传和策动后，湖北新军中约有1/3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即五六千人倒戈，加入了这两个革命团体。武昌以“天时”、“地利”、“人和”，形成了革命风暴的中心。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社”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关，共同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社”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联合反清。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6日（即中秋节）发动武装起义，并派人前往上海通过拍电报等办法，向尚在国外的孙中山请求派“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来武昌主持起义工作。然而，革命党人的活动很

快被清廷湖北当局察觉，处处遭到提防，再加黄兴等人未能及时赶到武昌，致使起义延期。

10月9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而受伤。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准备起义用的旗帜、文告、印信等物件。起义秘密泄露，汉口革命机关遭到破坏。情急之中，蒋翊武决定当晚以炮营炮声为号在武昌发动起义，但城门已被下令关闭，城内戒备森严，两湖总督瑞澂与清朝新军第八镇（师）统制（师长）张彪正按名册抓捕革命党人，机关也遭到破坏，30多人被捕（内有两位女革命党人），为首的彭楚藩、刘尧澂和杨洪胜被杀，3个人的脑袋被示威性地挂在城头上。送信人也未能到达炮营，炮号未响，各标（团）、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系。蒋翊武等见事已至此，被迫出逃而走，起义计划流产。

第二天（即10月10日）上午，已感到死亡严重威胁的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立即以自行秘密联络的方式，商定当晚以枪声为号提前发动起义，“死中求生”。于是，10月10日晚，新军第八工兵营“首先发难”，杀死前来镇压起义的反动军官，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随即占领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夺取武器。原“日知会”干事、工兵营左队队长吴兆麟被发动起义的官兵推举为临时总指挥。起义军缴获步枪数万支，火炮数十门，各类弹药数十万发，为起义胜利奠定了基础。

驻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听到枪声后，立即举火为号，“奋起响应”，纷纷率队如决堤的洪水冲出营房，涌向楚望台。聚集了多达3000多人的起义军，立即兵分三路，在一片震天撼地的冲杀声中发起进攻。起义军经一夜激烈战斗，于次日天亮前占领了两湖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瑞澂慌忙乘“楚豫”号兵舰从长江逃走，张彪也弃城逃往汉口，整个武昌城掌控在起义军手中。江对岸的汉口、汉阳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晚、10月12日光复了汉口和汉阳，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

起义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奉孙中山为领袖。由于孙中山当时远在美国，一时不可能赶回国内，直接组织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社”的领导人在起义前有的负伤，有的牺牲，有的出逃，均不在场，革命党人和立宪派骨干只得强推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为民政长，改国号为中华民国，立即发表《布告全国电》、《致满清政府电》和宣布“满洲”罪行的檄文，号召各省发动起义，“颠覆恶劣政府，建立共和国家”，迅速点燃了全国反清武装革命的熊熊烈火……

云南率先响应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风声所播”，一传到云南，滇省人民欣喜若狂，如醉如痴，“滇中军界跃然欲试”，摩拳擦掌，革命党人加快步伐，以刻不容缓之势，迅即发动武装革命，响应武昌起义，埋葬了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

关于云南辛亥武装革命爆发的具体时间究竟应该从哪一天算起，在全国是第几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在中国辛亥革命中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长期以来，很多人包括一些史学家一直习惯性地认为是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的昆明“重九起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一书就说：1911年10月22日，新军、会党在长沙发动起义；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策动新军、会党在西安起义；23日，江西新军在九江起义；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30日，云南发动起义。也就是说，云南在全国是第五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云南辛亥武装革命是腾越（即腾冲）起义、昆明“重九起义”和临安（即建水）起义的统称。这3次起义以昆明“重九起义”为主，以腾越起义最早，以临安起义殿后。

腾越起义的时间是1911年10月27日，距武昌起义只有17天，比山西起义早两天，“以革命先锋揭开了云南辛亥武装革命的序幕”；3天后，昆明爆发了“重九起义”，距武昌起义20天；11月1日，云南又举行了临安起义，距武昌起义亦只有22天。从1911年10月27日至11月1日（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云南相继爆发了3次武装革命，迅速宣告全省光复和统一。按腾越起义的时间计算，云南在全国应该成为继湖南、陕西和江西之后，第四个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省份，而且是革命最彻底的省份之一，从而在中国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否定或更改的。

回眸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以历史的高度从云南看全国，又从全国看云南，为什么地处边陲，远离武昌，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的云南能够站在时代的潮头，“敢为人先”，“英勇前驱”，成为全国率先响应武昌起义且为革命最彻底的省份之一呢？这主要是有辛亥革命前云南的三大历史基础等。

【参考文献】

- 1.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2.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
- 3.夏宗俊著：《中国历史大讲堂——清朝史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第二章 广泛的多民族群众基础

僻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为列强所觊觎。19世纪末期，英、法两国相继吞并了缅甸和越南，把缅甸和越南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并以此作为跳板把侵略的魔爪伸进了中国云南。“英伺其西，法瞰其南”，从西、南两面频频对云南进行侵略。特别是在中法战争后强迫清政府开口通商，相继签订了《滇越铁路章程》、《七府矿产开采权》和滇西划界等不平等条约。面对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能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任凭列强瓜分宰割。而且，在清政府的统治下，云南城乡满目疮痍，昆明街头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灾民，“民之受其虐待者不堪屈指”，而贪官污吏“坐分其润以饱私事囊，视滇民之痛而不恤”，以致“道旁死者，无人棺殓，鸦飞鹊集”，惨不忍睹。空前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体，互为作用，激起了云南各族人民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抗争：1899年，杨自元聚众夜袭蒙自城，赶跑勘察（滇越铁路）线路的法国人；1903年，周永祥领导个旧锡矿工人起义，喊出了“仇洋灭清”的响亮口号以及在此前后爆发的杜文秀起义、李文学起义、马嘉理事件和反抗英国侵占猛乌、乌得的斗争，昆明百姓烧毁法国教堂的案件。尤其是刘永福领导的抗法斗争和滇西北各族人民反抗英国入侵片马的事件，刀安仁领导的抗英反清斗争，以风起云涌、“搏击掀发”之势推动着云南各族人民在“内巩固基，外御强敌”的迫切感中不断觉醒，促进了云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形成广泛的多民族群众基础，为云南辛亥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抗法英雄刘永福



刘永福（1837~1917年）

刘永福（1837~1917年），字渊亭，本名义。清末抗击法、日侵略者的著名爱国将领。出生于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一个贫农家庭。20岁时参加太平军。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率部到广西、云南一带活动，所部因用七星黑旗为旗帜，以“黑旗军”而得名。

1869年，刘永福从越南凉山辗转进驻保胜（今越南老街），建立根据地，被越王封为“保胜防御使”。1873年10月，法国侵略军攻占东京（今越南首都河内），越南北圻军务节制大臣黄佐炎奉旨请刘永福出兵援救。刘永福看到越南人民濒临国破家亡，祖国西南边疆将受侵略，为严惩侵略者，同年11月21日率部与法军激

战于河内城西纸桥，击毙法军司令安邨，大获全胜，被越王任命为三宣副提督。1882年4月和1883年5月，刘永福部又两次与法军会战于纸桥。黑旗军将士英勇杀敌，法军尸横遍野，统帅李威业、副统帅韦医尸沉太平江。法军威风扫地，黑旗军乘胜追击，“威震四邻”，刘永福被越王封为一等男。

1884年8月26日，中国正式对法宣战，震惊中外的“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刘永福和黑旗军配合云贵总督岑毓英督师而来的3万余人，转战于云南河口、马关及越南老街等地，在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坐视虎帐门开，异疆动静了然”，“连克强寇”，一路奏凯，大败法军，引起法国总理茹费理内阁总辞职。正当中国军队准备乘胜追击，将法国侵略者赶出中国、赶出越南之际，岂料清政府为与法国和议，强令中国军队撤兵，刘永福只得忍痛领军退出云南。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刘永福调任台湾军务帮办，驻守台南。

当日军水、陆夹攻台南时，他与当地军民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第二年9月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和清政府不予支援的情况下，被迫忍痛撤离台湾，内渡厦门。台湾于1895年10月全部沦陷。因痛恨清政府丧权卖国的无耻行径，刘永福开始进行反清斗争，1911年9月9日在香港加入“同盟会”组织。一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出任广东民团总长，率部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晚年仍关心云南人民的反法斗争和越南的独立革命。1915年闻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立即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并再次倡议组建抗日义勇以驱除侵台日军。其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赞扬，至今在云南边疆传诵，激励着云南各族人民不断起来斗争，投身到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大潮中。

片马抗英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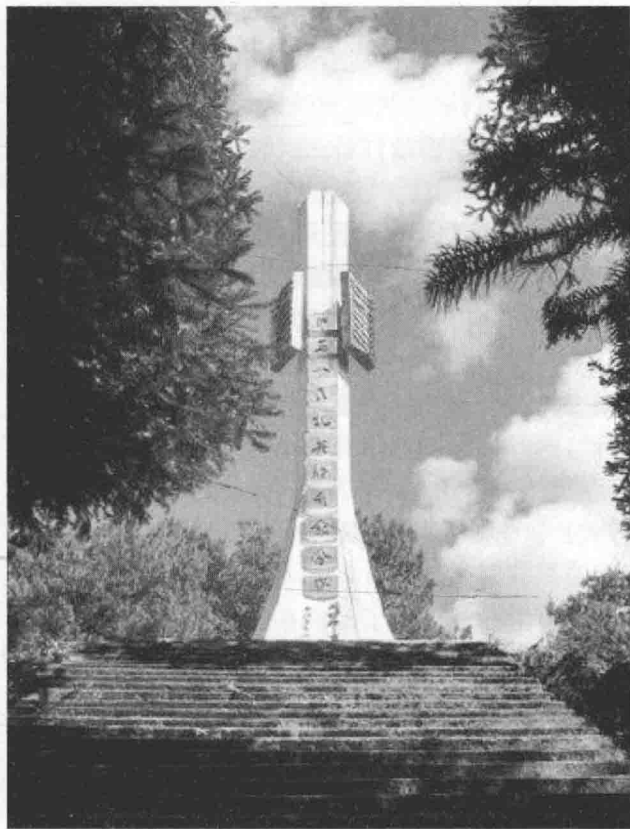
片马位于滇西北极边之地，是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的一个镇，全镇有片马、古浪、岗房3个村，居住着景颇、傈僳、独龙、怒、白等少数民族，森林密布，矿产资源丰富。

1900年，英帝国主义从它占领的缅甸派兵对云南边境的茨竹、派赖、滚马等地进行突然袭击，打死奋起抵抗的中国军民114人，制造了血腥的“茨竹事件”。片马与茨竹、派赖、滚马山水相连。英国占领茨竹等地的目的就是为了侵占片马，从这里打通到大理、经昆明直达重庆的商道，实现其掠夺中国大西南各种重要资源、控制西南经济命脉的“古柏计划”。

1911年1月14日，2000名英缅军乘高黎贡山大雪封山之机，强行占领了片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米字旗”下的枪炮声，粉碎了边境的和平与宁静。愤怒的片马各族民众立即以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组成“弩弓队”、“大刀队”等抗英武装团体，利用高山垭口和森林、河流等有利地形，打击侵略者，多次挫败了英缅军的进山围剿，打得侵略者魂飞魄散，终日不得安宁，只得龟缩在片马的大本营里。

英军入侵片马的消息传到内地，举国震惊，云南省会昆明社会各界人士举行了大游行，抗议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且成立了保界、保矿会，要求清廷出兵收复片马，收回被英、法霸占的云南七府矿权；北京、



耸立在苍松翠柏之中的片马抗英纪念碑

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也举行了示威游行，愤怒声讨英国对片马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支持片马各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在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下，英军又在片马受到当地民众武装的坚决抵抗，被迫于1911年3月从片马撤退，只留下少数兵员看守片马营房。同年4月14日，英国正式照会清廷，承认片马、古浪、岗房属于中国领土。但由于腐败的清政府未能派兵镇守，不久，片马又重新落入英军之手，各族人民

再次奋起武装抗争。持续不断的片马抗英斗争，进一步激起了云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为同年爆发的云南辛亥武装革命夯实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片马、古浪、岗房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8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怒江州时，亲笔为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题写碑名，高度赞扬了边疆各族人民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所做的贡献。

如今，片马已成为云南省首批20个国防教育基地之一。耸立在青松翠柏之间巍峨的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将永远向人们讲述着边疆各族儿女抗敌守土、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感人故事。

边塞伟男刀安仁

刀安仁（1872~1913年），云南省盈江县人，傣族，字沛生，又名郗安仁。1891年，19岁时因父亲年老多病，承袭土司职位，成为干崖（盈江新城、归城、弄璋一带）宣抚使第二十三代土司。同年秋，英帝国主义为扩大殖民地，举兵入侵干崖铁壁关地区（今属缅甸）。刀安仁火速调集四五百名土司兵到铁壁关大青树营安营扎寨，号召当地傣、汉、景颇、傈僳、阿昌等各族群众，共同组成相互支援的联合统一战线，采用“光天报信”和“七里蜂护窝”等丛林战术，击溃英军的侵犯，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侵吞我国领土的野心。1898年，英国再次要求勘定滇缅边界，清政府派出的勘界大臣刘万胜昏庸无能，听任英方官员摆布，竟将属于我国的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等大片领土割让给英属殖民地缅甸，并强令刀安仁立即撤军，否则军法从事。

英国侵略者从清廷官员手中轻易得到了他们在战场上拼命也得不到的东西，边疆各族民众浴血抗英胜利的成果毁于一旦。刀安仁“痛哭一场”，他满怀悲愤，用傣文写下长诗《抗英记》，倾诉了自己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愤怒和失望。



在日本留学时的刀安仁（1872~1913）

1905年，刀安仁到缅甸和印度进行考察。从印度返回缅甸时，在仰光认识了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熏陶的爱国华侨丘仁恩、庄银安等人。他们“彼此一见如故”，“各倾吐心腹，引为知己”，共同讨论了推翻清王朝封建帝制救国救民的问题。在其影响下，刀安仁表示回到云南后将组织滇西反清起义，并请他们前来相助。

刀安仁一到干崖，立即筹办了“军国民学校”，作为基地，培养军事人才，积蓄革命力量。这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革命党人秦力山（湖南人，后